



中国出版家
陆费逵

Zhongguo Chubanjia
LuFei Kui

柳斌杰 主编 周其厚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出版家丛书
ZHONGGUO CHUBANJIA CONGSHU



柳斌杰 主编 周其厚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宰艳红
责任校对:吕 勇
封面设计:肖 辉 孙文君
版式设计:汪 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家·陆费逵/周其厚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5
(中国出版家丛书/柳斌杰主编)

ISBN 978-7-01-015534-0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陆费逵(1886~1941)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9031号

中国出版家·陆费逵

ZHONGGUO CHUBANJIA LUFEI KUI

周其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9 插页:8
字数:230千字

ISBN 978-7-01-015534-0 定价:8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兼主编)

柳斌杰

副主任(兼副主编)

邬书林 吴道弘

执行副主任(兼执行副主编)

吴永贵

委 员

肖东发 袁 亮 方厚枢 周 谊

于国华 李景端 黄书元 郝振省

魏玉山 于 青

出版说明

出版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领域，同时，它也深深打上了“文化”和“思想”的印记。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交织着多种力量的动态关系，通过出版物的呈现和出版活动的开展，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而回旋折冲于其间者，则是那些幕后活跃、台前无闻的各类出版人。他们自喻“为他人做嫁衣裳”，事实上，却是国家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录的主要担当者，有出版发展的参与人和见证者甚至称他们所起的作用为保存民族记忆的千秋大脑。虽然扼据出版要津之地，却少见自家行当的人物传记出版。本丛书是第一次规模化地为这个群体中的杰出者系列立传，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代以降出版业的俯仰变迁，同时也见证着出版参与时代文化思想缔构及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那些曾经彪炳于时的出版人，一方面安身于这个行业，以其敏锐犀利的时代洞察，在市场、经营与创意中躬行实践，标领乃至规划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另一方面又在“安身”之外，显现出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从职业而志业的追求中，服务于民

族解放、思想启蒙与文化进步的社会性经营，书写了出版人生的风采、风骨与风流。

本丛书所传写的 50 余位出版人，均为活跃于 20 世纪并已过世的出版前辈。中国古代也曾涌现了陈起、毛晋等出版大家，只是未纳入本书的传主范围。丛书在体例上，有单人独传与多人合传之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主出版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轻重判别，许多情况下的数人合传，乃困于传主史料的阙如而不得已的选择，某些重要出版人如大东书局总经理沈骏声、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等，也囿于同样情形而未能列入本丛书的传主名单，殊觉憾事。虽说隐身不等于泯灭，但这个行业固有的幕后特征多少带来了出版人身份上的隐而不显、显而不彰。本丛书的出版，固然是想通过对前辈出版事迹的阐幽发微、立传入史，能让同样为人做嫁衣者的当今出版人不至于觉得气类太孤，内心获得温暖，并昭示后来者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追步于前贤，自觉立起一面促人警醒自鉴的镜子；同时更希望通过一个个传主微历史的场景呈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出版在产业之外，更是一项薪火相传的社会文化事业，它对时代文化的接引与外度，使其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势力”，在百余年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故此，我们推出这套“中国出版家丛书”，以展示中国文化创造者的风采，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职业精神，发掘出版史史料，丰富出版史研究和编辑史研究。

“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四月

前 言

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字伯鸿，号少沧，浙江桐乡人。中华书局创办人，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生于陕西汉中，长于江西南昌，创办中华书局于上海，毕生致力于促进文化、扶助教育事业，对民族与社会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陆费逵的主要著作有《实业家之修养》、《国民之修养》、《教育文存》、《妇女问题杂谈》、《青年修养杂谈》等。

陆费逵出生于 1886 年，先祖居住山东费县。据陆费逵自称，“陆费”姓氏由费姓而来。在明朝中叶，费氏家族迁到浙江桐乡，他的 17 世祖出嗣舅父陆氏，便改姓陆。又隔数代以后，因费氏本支无人，便兼祧两家，复姓陆费。陆费逵算得上出身名门望族，他的太高祖陆费墀，曾在清乾隆朝时任《四库全书》馆总校官，官至礼部侍郎、《四库全书》副总裁。但时过境迁，到陆费逵父亲陆费炆（字芷沧）时，家道中落，其父率家游幕陕西汉中府，陆费逵就出生于此。母亲吴幼堂，原籍浙江，出生在山西大同，通情达理，自学经书。陆费逵排行

老大，有弟二人，二弟陆费堉，字仲忻；三弟陆费执，字叔辰；有妹一人，早夭。

陆费逵从5岁开始读书，6岁时随父南下，居江西南昌，17岁在南昌与友人创办“正蒙学堂”，19岁在武昌开办新学界书店，20岁时接任《楚报》记者、主笔，因言论忤当局，报纸被查封而避走上海。其后，他相继任职于不同的出版机构，有昌明公司上海支店、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后自行创立中华书局。期间，他曾加入日知会，任评议员；发起成立上海书业商会，并担任领导职务；又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提交多项议案。1941年，陆费逵逝世于香港。

在27岁以前，有三个人对陆费逵影响最大。一是他的母亲吴幼堂，自小教他读书识字，她强调多读多看，不挖空心思做那些八股文章，奠定了他的道德品行和知识基础；二是近代“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陆费逵深受《时务报》、《清议报》上梁启超文章的吸引，自称“新思想”的获得，即得益于此；三是任职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佩服陆费逵的才识，将其延聘至商务印书馆。正是在这个书业大熔炉里的锤炼，造就了其近代出版家的素质。

从1902年开始，陆费逵开始步入社会，在以出版为业之前，他办过学、卖过书、主笔过报纸。其中的“《楚报》案”，对他的影响较大。1905年夏，应汉口《楚报》馆之邀，陆费逵与张汉杰、冯特民接办该报。《楚报》为湖北革命党人的重要报纸，创办于1905年，以新闻、论说为主要栏目。陆费逵倾向革命，痛恨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发表了许多言辞激烈、脍炙人口的政论性文章，有《本报改良祝词》、《论币政》、《论日俄和议相持之非计》、《日俄和议告成感书》、《论日俄仍有密约》、《论道路》、《论群蠹》、《论改革当从社会始》、《论亡国

罪魁》等。这些文章，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一事，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留美、留日学生的积极响应，坚持要求废约。此举引起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为不满，以“鼓吹革命”为名，下令查封《楚报》，逮捕报纸主笔，陆费逵只好逃往上海。

在上海，堪称陆费逵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他跻身书业，终成一代出版家，与此关系甚大。上海为近代被迫开放的第一批通商口岸之一，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而成为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都市。开放的上海成为西学传播，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自晚清以来，上海汇聚了一批新型文化人群体，与传统士大夫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渗透着更多的西学素养。同时，科举制的动摇和废除，使他们不再视读书做官为唯一价值取向，而是流动于报馆、学校、书局等文化机构。这里，书业集中、人才荟萃，加之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而且是国内有识者接受新知识的窗口，施展才华的宝地。上海绚丽多彩的文化环境，使陆费逵眼界大开、如鱼得水。起初，他任职于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为经理兼编辑员，并积极参与和发起成立“上海书业商会”，起草章程、主编《图书月报》（1906年创刊）。1906年，陆费逵任职文明书局，参与编写“文明教科书”，在教育界享有盛誉。1908年，他被招聘到商务印书馆，先在编译所，任国文部编辑。不久，又出任商务出版部长兼交通部长、师范讲义社主任。进入商务印书馆，对于陆费逵来说，至少有三个意义：一是他参与商务教科书的编写，主编《教育杂志》，提高了自己在教育界的声望。他的诸多教育主张和教育理念，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二是他结交了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如蔡元培、张元济、张

謇等人，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三是商务印书馆为当时最具特色的出版机构，早在1901年就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设编译所、发行所等，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模式对年轻的陆费逵有深远的影响。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首举义旗，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起义很快得到了南方各省的响应，清王朝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社会变革的气息冲击着教育界、出版界，而教学内容的更新，突出表现在教科书内容的变革。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决策层对革命能否成功，尚没有十足的把握，因而在更新教科书的内容上，表现得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这种局面，恰恰给胸怀远大抱负的陆费逵提供了机遇。陆费逵服务书业，早就有自办出版业的志向。更重要的是，他对革命怀有必胜的信心，并将教科书内容的更新与巩固革命的成果联系起来。认为教科书不革命，则不能灌输自由之真理、共和之大义、国家之学说。眼看清政府将要倒台，共和民国要建立，没有适用的教科书，革命的最后胜利不可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陆费逵约集戴克敦、陈寅等人，决定组织中华书局。在陆费逵的率领下，他们一面秘密编纂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一面积极筹划建立书局的各项工作。1912年1月1日，与中华民国诞生的同时，中华书局在上海宣告成立。

陆费逵对近代中国的主要贡献有：（一）他手创中华书局，献身出版事业。为了中华书局的发展，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他的主持下，中华书局出版大量著作、工具书、教科书、期刊杂志，成为我国近代第二大出版机构。陆费逵和中华书局对西方文化的传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近代新文化的创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他关注教育问题，强调教育与国家富强、社会文明的关系。他认为，

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教育不得道，则民智塞、民德退、民体弱，而国势衰亡。陆费逵提出实利主义教育主张，指出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并重，教育的本义在于培养国民人格，以发扬民国精神。当时，对于教育方针、学制、国语运动等问题，陆费逵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思想主张，奠定了他的近代著名教育家的地位。（三）他融合中西的文化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陆费逵在《教育主义》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西文化的优劣。认为中国文化的优点在于重心性而轻物质，缺点在无研究、无辨别。西方文化的优点，不在政治、经济、教育、实业，不在国富、兵强、器利，而在于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社会的德性以及科学、社会的精神，是我国文化中所缺乏的。因此，他提出，以东方伦理的精神，立身治家，而祛陋俗、辟谬说；以西方科学的精神，治学问干事业，而除偏见，减物欲，从而确立社会之基础。（四）他的爱国思想、奋斗精神，为出版界树立了典范。在《新中华》的创刊号上，他发表《备战》一文，论述应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提出“一致对外”“长期抗战”“将整个的财力、人材准备作战”的主张。随后，他还发表考证文章，指出东三省、热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陆费逵的创业精神，受到人们称赞。著名教育家俞庆棠把他和爱迪生、高尔基、叶澄衷、杨斯盛并提，称他们是“自己挣扎的模范”。

陆费逵是一个坚韧不拔、勇于进取的人。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而成长为有名的出版家和教育家，凭的是一股非凡的毅力。在自修学习期间，他订立计划，积极实施。不仅读古文、学史地，而且大量阅读反映时局变化、内容丰富多彩的报纸，并经常将心得写成笔记。1901—1903年，随父在南昌的陆费逵，隔日前往一家阅报

社。为节省时间，中午带饭吃，不回家。该社初时来阅者二三十人，到后来只剩他一人，并与管理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三年间，他把当时新出的书籍杂志，差不多完全看过，旧书也看了许多。遇到喜欢的字句，便抄在本子上；遇到不懂的内容，就马上做好标记，以便查阅书籍或请教别人。陆费逵学数学、外语等科目，同样发扬了不怕吃苦的精神。当他步入社会、服务书业时，自修读书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数十年如一日，从书本中获取丰富的营养。这为其后来著书立说，发表对出版、教育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陆费逵吃苦耐劳、朴素清淡的精神，素来为人们所钦佩。他深有体会地说过，天下的事越大越复杂，盘根错节也越多。如果不能忍耐，难免会功亏一篑。事实也正是如此，吃不得苦，耐不住清贫，是人生之大忌。我们从他经营新学界书店时的经历，不难看到这种品质。当时，店屋朝西，夏天非常炎热。店后小屋一间，半间作经理室，办事睡眠都在这里；半间作厨房，满是煤灰和油味。店内没有厕所，白天在隔壁客栈便溺，晚上要走半里路转三个弯去上街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陆费逵都忍耐着，从不说一句苦。久之，他形成了俭朴的生活作风，“从不为生活所屈”，终其一生而不变。陆费逵曾说，我们穷国人，要学苏俄的刻苦经营，或许有出头的日子；若学那富国的舒适，便是自寻死路了。他以此来勉励自己，也常常以此来告诫身边的人们。

陆费逵处事敏捷，自信果断，认准的事情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向着既定目标去追求。筹备中华书局之时，困苦万端，汉阳失守，大局未定，但他和同仁不为所动。更为重要的是，1917年，中华书局发生“民六危机”，财政枯竭，入不敷出。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邀

其去教育部任职，但陆费逵认为，出版业于国家、社会关系巨大，决不半途而废。他的岳父邀其入外交部任职，也被其婉言谢绝。这说明，即使在身受打击，事业低谷的时候，陆费逵也是强毅而专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盖事无论常变，必有几条路可走。我既认定一条路，即当机立断。否则徘徊犹疑，在我则无从下手，在人则无所适从，所谓歧路亡羊是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与一般的企业不同，出版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追求社会效益，如何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出版家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民国年间，伴随着多元文化的交融，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了阅读需求的变化。一些不良书商受利益的诱惑和驱使，将低级趣味的色情书、算命迷信书等印刷出版，推向市场。作为一家民营出版业，中华书局当然要追求利润，其出版物当然要考虑市场价值。但难能可贵的是，陆费逵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早就指出，书籍为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它们可以分为“善”和“非善”两类，那些好的书籍，可以涵养性情、培育人格、增长知识、营造舆论、消除祸乱、促使进化；那些不好的书籍，则足以淫荡人心、禁锢性灵、混淆是非、增加迷信、损失财产、导致死亡。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贡献社会，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则在无形中所获得的收益会很多；反之，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社会，则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书业商的人格，可以说是最高尚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的。为此，陆费逵多次强调：出版家应具有社会责任，讲职业道德。在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

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要大。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在陆费逵的领导下，中华书局不愿迎合社会的弱点，作投机的生意。无论什么出版物，都经过慎重考虑。不唯利是图，于营业之中兼顾教育与文化，于发展教育与文化中维持营业，成为中华书局遵奉的经营方针。

对于学术界来说，人们关注商务印书馆和相关人物的研究，无论是商务馆史、商务与近代文化的关系，还是商务的夏瑞芳、张元济、王云五等人，均有一批著作、传记和论文问世。相对而言，对陆费逵、对中华书局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近年来，随着近代出版史、文化史研究的深入，有些中华书局的老人写出对陆费逵的回忆文章，以及一批论述他的教育思想、经营管理的论文。但是，总体上来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现在的读书人，大都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书，而问及其创办者是谁，则鲜有能准确回答上来的人。更有甚者，长期以来，认为陆费逵是投机商人，是商务印书馆的“叛徒”，靠耍手腕起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他的评价。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完整的陆费逵传记出版。一方面是囿于资料的缺乏，陆费逵忙于中华书局的事务，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另一方面，他的许多信件、登载其文的报纸，或散逸民间，或无从查考。加之中华书局新中国成立前的档案资料，有许多仍然沉睡箱底，没有能够整理出来。这些，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陆费逵的研究。

陆费逵的事业在中华书局，他一心为了书局事业的发展，身无财物，家无巨资。在他身后，没有遗产留给后代，即使别人赠送的书画等物，也为书局所有。他待人谦和，对同仁的学习、生活总是挂记在心，予以适当的帮助。他性格鲜明，处事公正；他光明磊落，从不盛气凌人；他心怀坦荡，总是与人为善。在他的领导下，偌大一个书

局，同仁相处和谐、愉悦，工作热情很高。因而历经坎坷的中华书局，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形势下，立足市场、稳步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天的中华书局，仍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扶助学术、促进文化，正是秉承了这种优秀的传统。

纵观陆费逵的一生，他服务社会近40年，经营出版业达38年，于我国教育、文化的发展贡献甚巨。他是一个爱国的出版家、教育家和思想家。

本书以陆费逵创办与经营中华书局为线索，从他步入社会开始，书业经历、编辑生涯奠定了他出版家的素养。随后，他创办中华书局，立足书业，遭遇“民六危机”磨难，但终于挺过来了。陆费逵在民国前后，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并演变为出版理念与方针，中华版教科书、教育图书、国语图书等，都是其教育思想在出版实业上的反映。中华书局以一家民营出版业，在教育上的巨大贡献，与他的这种思想及出版理念有关。陆费逵重视发展综合业务，配合时代文化浪潮，策划并主持工具书、古籍与译作。同时，他非常重视印刷技术的引进与提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上述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他的经营管理策略。中华书局经营中的“陆费风格”，独具特色，历久弥新。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历经书业的磨炼	001
一、主持正蒙学堂	002
二、开办新学界书店	003
三、任职昌明公司上海支店	006
四、进入文明书局	009
五、在商务印书馆	011
第二章 主持报刊的编辑	016
一、《楚报》主笔	016
二、《图书月报》主编	022
三、《教育杂志》主编	027

第三章	创办中华书局	035
一、	辛亥革命的爆发	035
二、	创办中华书局	038
第四章	顺应时势立基业	044
一、“教科书革命”	044	
二、	设立分局	048
三、	创刊杂志	053
第五章	“民六危机”的波折	063
一、	危机的发生	063
二、	出租与收回	070
三、	反思与举措	073
第六章	以出版促进教育	081
一、	倡导教育改革	081
二、	实地考察教育	102
三、	出版教育图书	122
四、	投身国语运动	138
五、	与时俱进的教科书	155
第七章	编纂工具书	182
一、	《中华大字典》	183
二、	《辞海》	190